

李冰治水离堆的名实迁转与意涵变迁

杨 朗

提 要：李冰治水离堆的具体位置与功能、意涵是历史上争论较多的问题。唐代以前所载之离堆，确切位置在今乐山乌尤山，离堆一词是对古蜀语“雷砥”等音的汉语翻译。唐代以后，因离堆原初意涵已不被知悉，加之文献错讹与前人误读，出现了灌县离堆与雅州离堆两说。灌县离堆之说在后世成为主流，前人认知中“凿离堆”与“穿二江”两事合而为一，离堆转变为分岷江水的水利设施。雅州离堆的名实变迁颇为复杂，其既与雅州得名相纠缠，又被区位重构至多处。对治水离堆的不断诠释与各时代认知的层累叠加，使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呈现出多层次、多维度的面相。治水离堆的名实迁转与意涵变迁是巴蜀历史断裂与延续的具体表现，也反映出古人地理认知的模糊性。

关键词：离堆 李冰 巴蜀地区 名实关系

离堆，在今人的认知中既可指文化意义上具体的历史古迹，如都江堰离堆、乐山乌尤山离堆，也可宽泛指代地貌学意义上孤立河谷中的小丘。^①实际上，离堆一词的出现与李冰治水的事迹密切相关，故可将此类传为李冰所凿的离堆统称为治水离堆。在历史上，蜀中治水离堆经历数次名实迁转，相应的意涵也发生较大变迁。具体而言，治水离堆的所在地有三说，分别为乐山乌尤离堆、灌县离堆与雅州离堆。持灌县离堆者，以唐以后文献记载为据，论者多叙治水离堆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关系^②；持乌尤离堆者，以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华阳国志》等文献为立论重点^③；持雅州离堆者，以《水经注》之记载为判断依据。^④从古至今，此三说相互之间争论颇多，虽未有相对权威的定论，但以灌县离堆之说的支持者众多，其浩大之声势相应掩盖了其他两说。^⑤

前贤研究的着眼点多在于对治水离堆位置的考证，缺乏对治水离堆不同说法生成、变化的历

① 参见《辞海·地理分册·中国地理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21页。

② 参见刘沅：《槐轩全书·槐轩杂著》卷2，巴蜀书社，2006年影印本，第9册，第3383—3388页；罗骏声：《离堆考》，《国学论衡》1936年第8期；李承三、周廷儒：《离堆与离堆山考》，《地理》1941年第3期；许肇鼎：《漫谈四川的离堆——兼谈〈史记〉所载李冰凿离堆的所在地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77年第3期；魏达议：《〈史记〉中之“离碓”、“沫水”辨析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2年第6期；张勋燎：《李冰凿离堆的位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2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胡渭著，邹逸麟整理：《禹贡锥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75页；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38页；刘琳：《离堆辨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84年第1期；向玉成：《李冰与乐山治水相关问题》，《文史杂志》2003年第3期。

④ 参见杨慎：《升庵集》卷78，“四库明人文集丛刊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影印本，第1270册，第779页；郦道元撰，杨守敬纂疏，熊会贞参疏，李南晖、徐桂秋点校，陈桥驿审定：《京都大学藏钞本水经注疏》卷36《沫水》，辽海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660页。

⑤ 郭沫若曾于1955年作《观离堆题词》：“离堆所在，或以为乃嘉州乌尤山。余嘉州人也，今至此观宝瓶口，犹余斧凿痕，谓在嘉州者乃妄说也。”此为灌县离堆之说增添相当程度的官方色彩，后之论者述及李冰与都江堰工程时大多径直认定凿离堆处在灌县。参见郭沫若：《观离堆题词》，灌口镇志编纂组：《灌口镇志》，内部资料，1983年，第219页。

时性脉络梳理,对其意涵变迁亦关注不多。本文采取顺时而观的视角,将史料放回至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中,力图对各时段川江治水离堆的名实与意涵进行考辨,并阐明名实迁转的过程与原因。以治水离堆为个案,或可加深对巴蜀历史断裂与延续的认识,也可侧面反映出传统时代地理认知的某些特征。

一 李冰凿离堆所在地与离堆原初意涵

离堆最早作“离碓”,见载于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:

自是之后,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,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……于蜀,蜀守冰凿离碓,辟沫水之害,穿二江成都之中。^①

后世多认为此则记载中“蜀守冰凿离碓”之处在灌县,专释此条者,如钱穆《史记地名考》中并列灌县、乐山与洪雅三说^②,郭声波《〈史记〉地名族名词典》亦并列乐山与灌县二说,并未下定论。^③清人胡渭,近人任乃强、刘琳则认为其应在今乐山乌尤山。笔者认为乐山乌尤山为李冰凿离堆之地最为可取;同时,对其判断应以唐代以前之记载为重,方可阐明离堆一词的原初意涵。

《汉书·沟洫志》基本沿用《史记》的文字:“于蜀,则蜀守李冰凿离碓,避沫水之害,穿二江成都中。”^④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记载虽简略,但反映出“凿离堆”是为“避沫水之害”,这一判断位置的关键信息。按,唐代以前所称之沫水,明确指今之大渡河,《史记》载:“西至沫、若水,南至牂柯为徼,通零关道,桥孙水以通邛都。”^⑤《说文解字》载:“沫。水。出蜀西徼外,东南入江。”^⑥《水经注》亦载:“沫水出广柔徼外,东南过旄牛县北,又东至越嶲灵道县,出蒙山南,东北与青衣水合,东入于江。”^⑦由此可知,李冰凿离堆的目的是避大渡河之水患,其位置不应在远离大渡河的灌县。

相较《史记》《汉书》,《华阳国志》对李冰避沫水害之事记载更为详细,对其地记载也更为明确:

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,伏行地中,会江南安,触山胁溷崖,水脉漂疾,破害舟船,历代患之。冰发卒凿平溷崖,通正水道。或曰:冰凿崖时,水神怒,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,迄今蒙福。

南安县,郡东四百里,治青衣、江会。县溉有名滩,一曰雷(垣)[抵],二曰盐溉,李冰所平也。^⑧

① 《史记》卷29《河渠书第七》,中华书局,1959年标点本,第1407页。

② 参见钱穆:《史记地名考》(下),商务印书馆,2001年,第1416—1417页。

③ 参见郭声波:《〈史记〉地名族名词典》,中华书局,2020年,第413—414页。

④ 《汉书》卷29《沟洫志第九》,中华书局,1962年标点本,第1677页。

⑤ 《史记》卷117《司马相如列传》,第3047页。

⑥ 许慎撰,陶生魁点校:《说文解字点校本》,中华书局,2020年,第351页。

⑦ 酈道元著,陈桥驿校证:《水经注校证》卷36《沫水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827—828页。

⑧ 常璩撰,刘琳校注:《华阳国志校注》,巴蜀书社,1984年,第207、281页。

结合《华阳国志》对李冰相关事迹的记载,可知凿濶崖、平雷砥即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所载凿离堆之事。同时亦可明晰,“沫水之害”是指大渡河与岷江因两江交汇而“水脉漂疾,被害舟船”,李冰通正水道之处则在南安县(今乐山市),具体即今乐山乌尤山。大渡河历代水患频发,尤其是与青衣江汇流后,水量剧增而流速不减,故在与岷江交汇处河水直冲乌尤山,形成急流回环,危害行舟。值得注意的是,历史时期大渡河主河道在今乐山大佛坝以南,直至明初大水,方改主道于大佛坝北侧,明人安磐所撰《嘉定州修城记》有载:“尝闻之父老云,永乐中州学在岸南数十步,以今计之正当中流。”^①秦汉时,无大佛坝提前分水,沫水老河道更是正对岷江中之乌尤山,水流对其冲击尤为剧烈。今乌尤山为岷江中之孤岛,常璩所谓李冰“发卒凿平濶崖”,应是指凿开或疏通乌尤山以东的岷江小河道(俗称麻浩水),分两江汇流之水于其中,以杀水势。

秦汉时期,蜀地经济文化集中于成都小平原、临邛与南安组成的三角地带^②,岷江水道是蜀地重要的交通路线。凿离堆虽为疏通岷江水道,然岷江于南安县危害行舟之原因不在于沫水冲击,故史书中称其事为“辟沫水之害”。任乃强也已指出乌尤山的岩石质地松软,李冰时代完全具备凿崖开江、通正水道的能力。^③

从一例旁证中亦可证明李冰所凿离堆为今乐山乌尤山。扬雄《蜀都赋》叙成都平原周边形势时有言:

东有巴賨,绵亘百濮。铜梁金台,火井龙湫……南则有犍泮潜夷。昆明峨眉,绝限岷嶴,堪岩亘翔。灵山揭其右,离堆被其东。^④

“灵山揭其右,离堆被其东”一句是对成都平原两处东西方位相对之形胜的描写。其中汉代之灵山多出现于“开西南夷”一事的记载中。司马相如《难蜀父老》有言:“故乃开沫、若,徼泮轔,镂灵山,梁孙原。”^⑤《史记》载其事为:“南至泮轔为徼,通零关道,桥孙水,以通邛都。”^⑥《汉书》则作“通灵水道”^⑦。灵山之具体位置虽不可考,然其应位于汉代之零关道(灵关道)、零道县(灵道县)境内,即今甘洛县、峨边县一带。^⑧可知,灵山地处成都平原西侧,而离堆则应在成都平原东侧。江水(岷江)自成都至乐山虽为正南流向,然秦汉魏晋时人认知中其则为东流或东南流,连带认为南安县在成都平原之东。如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南安县,郡东四百里”^⑨,《水经注》亦载:“(江水)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,青衣水、沫水从西南来,合而注之。”^⑩“离堆被其东”之言,与秦汉魏晋时人所认知的乐山乌尤离堆方位相合。

通过上文考证,更进一步证明胡渭、任乃强、刘琳等人的观点,即乐山乌尤山为李冰凿离堆

① 嘉庆《乐山县志》卷13《艺文志·文一》,光绪十三年(1887)刻本,第21页。

② 参见蒙文通:《巴蜀史的问题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1959年第5期。

③ 参见常璩撰,任乃强校注: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,第138页。

④ 扬雄:《蜀都赋》,严可均编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汉文》卷51,中华书局,1958年,第402页。

⑤ 司马相如:《难蜀父老》,严可均编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汉文》卷22,第247页。

⑥ 《史记》卷117《司马相如列传》,第3047页。

⑦ 《汉书》卷57《司马相如传》,第2581页。

⑧ 参见常璩撰,刘琳校注:《华阳国志校注》,第316页。

⑨ 常璩撰,刘琳校注:《华阳国志校注》,第281页。

⑩ 酈道元著,陈桥驿校证:《水经注校证》卷36《沫水》,第768页。

的所在地。然前贤并未对“离堆”一词的原初意涵多做申论。^①实际上,在唐代以前,离堆并未有固定写法。《史记》中作“离碓”,裴驷集解云:“晋灼曰古堆字。”^②《汉书》作“离𡵚”,《班马字类》释“𡵚古堆字”^③。此两处尚可理解为“碓”“𡵚”二字是“堆”同字异写。然而,离堆在除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外的唐代以前文献中,却也有与“离堆”字形完全不同的写法。《华阳国志》中离堆作“雷(垣)[抵]”。^④《水经注》相关记载虽大体沿用《华阳国志》,然“雷抵”作“垒抵”^⑤。此外,东汉《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》中有“感蜀守冰,殄绝犁魃”^⑥一句,宋人洪适释其云:“周君思夏后龙门之绩、感李冰离堆之事,排治湍梗”^⑦,可知,离堆又可作“犁魃”。前文已述,《华阳国志》中李冰凿湍崖、平雷抵,即为凿离堆之事。常璩作为蜀地士人,应不至于将“离堆”误作“雷抵”,凭借其对蜀地之了解,“雷抵”二字的出现必有其源。“犁魃”更与“离堆”的写法相去甚远。故以同字讹误,解释“离堆”在唐代以前有多种写法的理路不通。然而“离堆”“雷抵”“犁魃”等却读音相近,这应是同音异写的结果。

南朝蜀人李膺《益州记》中的一则佚文为我们提供了解读“离堆”原初意涵的切入口,其文载:“(青衣神)神号雷蜚庙,班固以为离堆下有石室玉女房,盖此神也。”^⑧可知,雷蜚本为青衣神号之意。据徐学书研究,“雷蜚”为“嫫祖”同音异写,蚕丛氏嫫祖为蜀地蚕业始祖者,又被称为“青衣神”^⑨。蚕丛信仰本是被川西北的蜀人先民通过岷江水系带入四川盆地^⑩,而世居此地的藏缅族群“以神名山”之现象又相当普遍。可以判断,在先秦秦汉时期,蜀地之民以近“雷蜚”之音的名字称乌尤山,其名本意是指蜀地所崇奉的青衣神嫫祖。

如此,“离堆”一名的原初意涵也已明晰,其为中原之士人对“雷蜚”“嫫祖”等古蜀语言的汉语翻译。太史公本人到过蜀地,其自述“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”^⑪,也亲自踏足过乌尤山离堆,在采录当地历史时,耳闻此处音为“雷蜚”的地名,然或并不明晰其含义。故太史公结合乌尤山孤悬江中的地理情况,利用中原的知识体系,如“离”字的分散、离散之意,以及“碓(堆)”字的积累、聚合之意,将其地翻译为离碓。《汉书》继承其文本,但将“碓”异写作“𡵚”,而蜀地的地方性文献中并未遵循相应之写法,而生发出“雷抵”“雷蜚”等同音的异写。

综上所述,离堆本指乐山乌尤山,这一被古蜀人称作“雷蜚”之音的具体地点,该词本身非中原固有,也并非大多数今人所理解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具体设施的称呼。

① 刘琳已指出“离堆”一词应为对古蜀语的音译,但并未释其义,参见刘琳:《离堆辨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84年第1期;唐长寿亦注意到离堆的多种名称,然并未就其相互关系进行详论,参见唐长寿:《乌尤山与嫫祖、青衣神》,《文史杂志》2016年第3期。

② 《史记》卷29《河渠书第七》,第1407页。

③ 娄机撰,李曾伯补遗:《班马字类附补遗》卷1,中华书局,1985年影印本,第45页。

④ “垣”字应从《水经注》作“抵”,参见常璩撰,刘琳校注:《华阳国志校注》,第282页。

⑤ 酈道元著,陈桥驿校证:《水经注校证》卷36《沫水》,第770页。

⑥ 倪涛编,钱伟强等点校:《六艺之一录》卷45《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》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5年,第986页。

⑦ 洪适:《释隶》卷4,明万历十六年(1588)刻本,第16页。

⑧ 孙琪华著,蒙默、黎明春整理:《〈益州记〉辑注及校勘》,巴蜀书社,2015年,第45页。

⑨ 参见徐学书:《嫫祖、蚕丛、冉駹与羌族的渊源关系研究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23年第1期。

⑩ 参见霍巍:《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3年第1期。

⑪ 《史记》卷29《河渠书第七》,第1415页。

二 治水离堆意涵转变与灌县离堆兴起

唐代以后，治水离堆的名实相当程度发生迁转，最显著的表现便是灌县离堆之说兴起并成为主流。同时，文士对离堆一词以新的意涵加以诠释与重构，治水离堆的原初意涵被渐渐遗忘，“辟沫水之害”的功能被分岷江水所替代，离堆成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中某一设施的名称。

唐人论述中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所载“凿离堆”与“穿二江成都中”二事被合为一事。左思《蜀都赋》“带二江之双流，抗峨眉之重阻”一句，李善注曰：“其后置蜀郡，以李冰为守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蜀守李冰凿离堆，穿两江，为人开田，百姓飨其利。是时蜀人始通中国，言语颇与华同。故言开国于中古也。”^①白居易对“二江灌锦城”与“凿离堆”二事的诠释分别为：

《史记·河渠书》曰：蜀守李冰凿离堆山，辟洪水之害，穿二江灌成都中，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用溉浸，百姓又享其利，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渠以亿计，莫之数也。^②

《沟洫志》蜀守李冰凿离堆，穿三江成都中，皆可船行，百姓享其利，往往引水溉田。^③

可知，唐人认知中，李冰所凿离堆的功能转变为分岷江水以灌溉成都平原。虽以上二处皆引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记载，但相关内容已被误读，“辟沫水之害”的原初功能或被忽略，或径将“沫”改为“暴”，以合分水之意。

延及宋代，灌县治水离堆之说已成主流，相关的记载也更为丰富，如黄休复《茅亭客话》中“蜀无大水”条载：“（李冰）凿山离堆，辟沫水于南北为二江，灌溉彭、汉、蜀之三郡，沃田亿万顷。”^④《方輿胜览》载：“三江，一名汶江，一名流江，经县南七里……《皇朝郡县志》：初，太守凿离堆，又开二渠：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，谓之外江；一渠由永康过郫入成都，谓之内江。”^⑤宋代地理志书中，《輿地纪胜》对灌县离堆记载最为丰富：

离堆，在（永康）军南。即蜀守李冰凿之，以避沫水之害。事见《史记·河渠书》。应劭《风俗通》云：“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，冰凿离堆，开成都两江，溉田万顷。”东坡诗云：“远溯江水穷离堆。”

都江水，在导江县北二十里离堆之下。《寰宇记》曰：“江水至灌口，支流入都江口，灌五州十二县，即李冰所凿离堆之下江也。”

伏龙观，在离堆上。^⑥

从上述引文可知，宋人更为明确地指出了灌县离堆的位置所在，具体为今都江堰市离堆公园内，伏龙观与观澜亭一线的突出江中而三面环水的半岛。同时，《輿地纪胜》对乌尤离堆的记载与王

① 高步瀛著，曹道衡、沈玉成点校：《文选李注义疏》卷4《蜀都赋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883页。

② 白居易：《白氏六帖事类集》卷2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影印本，第1册，第42页。

③ 白居易：《白氏六帖事类集》卷3，第1册，第71页。

④ 黄休复撰，赵维国整理：《茅亭客话》卷1《蜀无大水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10页。

⑤ 祝穆撰，祝洙增订，施和金点校：《方輿胜览》卷51《成都府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908—909页。

⑥ 王象之编著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輿地纪胜》卷151《永康军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3213、3222页。

象之于该条目下发表的议论，颇能体现宋人认知中的治水离堆的意涵：

孤山，即离峯山。离峯者，孤山也。诂训云：尔蜀江有离峯，蜀汉亦有离峯，府治孤山，当涪江、沫水孔道。曰乌尤者，四面崭立，乃真离峯。与《永康记》不同。象之谨按：离之与孤自是两义。江州之大孤、小孤，取其孤立于江中之义也。漓湘有湘水、漓水，取其初本于一源，强分为二，以其有相离之义也……今嘉州之离峯，乃天然孤立，名之曰孤山，正犹江州之大小二孤命名是矣。永康、崇德之离峯，乃秦太守李冰凿山为二，中为大渠，引水灌成都以通堰水，其取相离之义，亦犹湖南之漓水耳。命曰离峯，岂不甚当？今《嘉定志》乃指孤山以为离峯，二义殊不相类，既故老相传，姑两存之。^①

乌尤离堆的历史记忆，仍在地方通过“故老相传”的方式延续，然王象之对此并不认同，而认为灌县离堆方为李冰所凿。其论证理路是从“离”之字义入手，举出湘水、漓水之例，视“湘漓”为“相离”是宋人对两水的新阐释。^②王氏认为离堆之“离”，应也是取相离之义，此与灌县离堆分水岷江相合。以此为对照，乌尤山虽四面环水，却并不具有显著的分离江水的特征，以“孤山”命之更为恰当。

元人对灌县离堆的论证，并未沿宋人取“离”为相离之意的理路继续，而是从释地入手，希冀解决沫水不在灌县的矛盾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中对此详论：

岷江水发源处古导江，今为永康军，《汉》《史》所谓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，辟沫水之害，是也。沫水出蜀西徼外，今阳山江、大皂江皆为沫水，入于西川。始，嘉、眉、蜀、益间，夏潦洋溢，必有溃暴衡决可畏之患。自凿离堆以分其势……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，而耕桑之利博矣。^③

岷江、沫水确均发源于蜀西徼外，阳山江即今大渡河，其于秦汉被称为沫水无疑，然认为大皂江（今金马河流路）亦称沫水，却与史无据，与秦汉魏晋时人的认知相抵牾。此种论证颇有观点先行之感，为强合灌县离堆与“辟沫水之害”的矛盾，而径视大皂江为沫水。今之论者亦有延续此种论证理路者。^④

明清时期，灌县离堆的认知依然保持稳固。《大明一统志》载：“李冰，蜀郡守。凿离堆以灌溉诸郡，沃野千里而无水害，号为陆海，蜀人德之。”^⑤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则载，“离堆山，灌县西一里，李冰凿湫崖以避沫水之害”^⑥，万历《四川总志》亦延续此文字。^⑦而后，清康熙《四川总志》、雍正《四川通志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》中，相较蜀中其他离堆，灌县离堆记载最详，也对离堆具体分水情势有详细记载，如其被作为测量水位的水则。^⑧此也侧面反映出灌县离

① 王象之编著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46《嘉定府》，第3094页。文字错讹以今人校正为据而改。

② 参见刘继元：《“三湘”释义及范围的历史演变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16年第1期。

③ 《宋史》卷95《河渠五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标点本，第2375页。

④ 参见魏达议：《〈史记〉中之“离碓”、“沫水”辨析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2年第6期。

⑤ 李贤等撰，方志远等点校：《大明一统志》，巴蜀书社，2017年，第3003页。

⑥ 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卷3《郡县志·成都府》，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刻本，第13页。

⑦ 参见万历《四川总志》卷5《郡县志·成都府》，万历九年（1581）刻本，第12页。

⑧ 离堆作为水则测量水位，在《蜀中广记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》、光绪《增修灌县志》等均有详载。

堆之说的主流地位。

清末刘沅作《江沱离堆考》《江沱离堆石犀考》《内外江考》《离堆赘说》四文，结合内外江与离堆分水之功用，试图更为详尽地论证灌县离堆的正确性，其思路兼顾宋人释字与元人释地两面。释字方面，刘氏认为，“离堆，离，离也；堆，堆也。山足支出为陵，与山若不相属，故曰离堆”^①，此种地势与灌县离堆相符。释地方面，其认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之沫水并非大渡河，“沫水者，外江也，江从岷山而来，左右二流会于灌口，一水色黧，故名沫江”^②，从水色释沫水之名。以刘沅之学识，应不至于误识外江为沫水，或因当时灌县离堆之说声势过大，刘氏受其影响而形成了灌县离堆的固有认知。

唐代以后，李冰所凿之离堆在灌县的观点成为主流，治水离堆的意涵也从原初之青衣神嫫祖转变为灌口分江的水利设施。灌县离堆之说的产生有两点原因，其一，唐代以后离堆原初意涵已不被人所知；其二，前人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内容的误读。然而，灌县离堆之说能占据主流，需着重考虑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，最为关键之处为：由灌县起源的李冰信仰在巴蜀地区的兴盛，以及灌县离堆逐渐被赋予的多元文化符号意涵。

唐代以后灌县李冰信仰渐趋浓厚^③，其地大量塑造相关景观，并重构李冰之事迹，其中与凿离堆相关者不在少数。如《舆地纪胜》载：“按李注《治水记》载，蜀守父子擒健蛙，囚于离堆之趾，谓之伏龙潭，后立观于其上。”^④范成大亲临灌县离堆，记录道：

又登怀古亭，俯观离堆。离堆者，李太守凿崖中断，分江水一派入永康以至彭、蜀，支流自郫以至成都。怀古对崖，有道观曰伏龙，相传李太守锁孽龙于离堆之下。观有孙太古画李氏父子像。^⑤

又作《离堆行》一诗，描述灌县之李冰信仰与祭祀活动：

蜀旱，支江水涸，即遣官致祭，壅都江水以自足，谓之掇水，无不应。民祭赛者率以羊，岁杀四五万计……封羊五万大作社，春秋伐鼓苍烟根。我昔官称劝农使，年年来激西江水。成都火米不论钱，丝管相随看蚕市。^⑥

宋代灌县之李冰信仰与相关祭祀活动已经相当繁盛，李冰亦因凿离堆、便利蜀地灌溉之事，在灌县被神格化为所崇祀的对象。灌县地方对于相关景观与故事的建构，传递出此处为真离堆的暗示。此种地方叙事被亲临此处的文人雅士所接受，相关的诗文歌颂也反向强化了灌县离堆的认知。

伴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后世认知中历史地位的提升，作为其中重要的分水设施，灌县离堆被赋予多元文化符号价值，这既是其主流地位的具体表现，也从更广的维度上传播、稳固了灌县

① 刘沅：《槐轩全书·槐轩杂著》卷2，第9册，第3386页。

② 刘沅：《槐轩全书·槐轩杂著》卷2，第9册，第3385页。

③ 参见郭祝崧：《李冰化神过程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4年第1期。

④ 王象之编著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51《永康军》，第3222页。

⑤ 范成大撰，孔凡礼点校：《吴船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188—189页。

⑥ 范成大著，辛更儒点校：《范成大集》卷13《诗·离堆行》，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328页。

离堆之说。

首先,灌县离堆被认为是泽润巴蜀、修渠利民的标志。朱熹有言:“论鬼神之事,谓蜀中灌口二郎庙,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。”^①元人揭傒斯撰《赐修蜀堰碑》,其文曰:“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,川蜀以饶。”^②明清时期,随着李冰信仰在全川的兴盛,灌县离堆作为都江堰工程的显著表征,被大量颂扬。万历《四川总志》载:“至秦李冰凿离堆以疏沫水,众渠顺流,沃野千里,号称陆海。”^③清代对李冰与李二郎有多次敕封^④,其中雍正五年《请李冰李二郎封号疏》叙李冰父子之功:“蜀守李冰使其子二郎除水怪、凿离堆,穿内外二江,灌溉成都等州县稻田,使沃野千里。”^⑤四川各地方志亦大量出现对灌县离堆的称扬,其中不乏并非都江堰灌区之地,如咸丰《开县志》中,叙述水利要先论“蜀自李冰凿离堆、文翁穿湔江,水利有自来”^⑥。乾隆《安岳县志》亦载:“李冰凿离堆,文翁穿湔江,至今蜀东西尤享万世之利。”^⑦总之,灌县离堆逐渐成为全川一致认同的符号,代表成就天府、泽被巴蜀,也成为地方官员兴水利之功的标榜。

此外,由于古人认知中岷江为长江正源,踞灌江口之离堆,也成为江水上游的代表符号。如宋人周文璞《瞿塘神君歌》中有言:“离堆顺流已受命,一下不打天吴鞭。”^⑧许及之《上南轩先生寿》亦曰:“岷峨一线江滥觞,意行万里无留藏。五湖洞庭状熊湘,衡岳岿然锁其旁。离堆砥柱屹相望,湍流横溃不得狂。”^⑨

同时,对于远离巴蜀之人来说,离堆也成为蜀地家乡的象征,此在苏轼之诗文中体现尤为明显,其《雪浪石》一诗言:“画师争摹雪浪势,天工不见雷斧痕。离堆四面绕江水,坐无蜀士谁与论……此身自幻孰非梦,故园山水聊心存。”^⑩时苏轼身在河北定州,见雪浪石之纹理,联想到离堆之状,然又咏叹“坐无蜀士谁与论”,一方面是感叹自身远离故土,另一方面也传达出非蜀地之士,难明离堆真正的意蕴。

民国以降,传统时代灌县离堆的符号意涵得以延续,尤其作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关键设施,灌县离堆因代表中国古代水利的卓越成就而被强调。例如钱承绪编著的《中国之水利》中便有言:“战国时李冰凿离堆以灌成都诸郡,遂成沃野千里。”^⑪《扬子江之水利》中亦有论:“都江堰灌溉工程,其地范围之广,历史之久,均足为吾国筑堰引渠工程之模范……秦太守李冰铸都江堰,凿离堆,使外江(岷江正流)之水,分流入内江,且限制其流量,于是水灾以免,而灌溉之利兴。”^⑫此外,1926年邓锡侯将改建于清末桑园基础上的“都江公园”更名为“离堆

① 黎靖德编,王星贤点校:《朱子语类》卷3《鬼神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53页。

② 揭傒斯:《赐修蜀堰碑》,杨慎编,刘琳、王晓波点校:《全蜀艺文志(下)》卷47,线装书局,2003年,第1459页。

③ 万历《四川总志》卷20《经略志·水利》,第6页。

④ 参见郑民德:《水患治理与神灵塑造——以李冰为对象的历史考察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18年第3期。

⑤ 嘉庆《四川通志》卷81《学校志六·祀典》,嘉庆二十一年(1816)刻本,第47页。

⑥ 咸丰《开县志》卷13《水利》,咸丰三年(1853)刻本,第1页。

⑦ 乾隆《安岳县志》卷2《土地部·堤堰志》,乾隆五十一年(1786)刻本,第11页。

⑧ 周文璞:《瞿塘神君歌》,曾晓娟主编:《都江堰文献集成·历史文献卷·文学卷》,巴蜀书社,2018年,第328页。

⑨ 许及之:《上南轩先生寿》,曾晓娟主编:《都江堰文献集成·历史文献卷·文学卷》,第99页。

⑩ 苏轼:《雪浪石》,王文浩辑注,凡礼点校:《苏轼诗集》卷37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999页。

⑪ 钱承绪:《中国之水利》,中国经济发行会,1941年,第23页。

⑫ 孙世辅:《扬子江之水利》,商务印书馆,1939年,第66页。

公园”^①，以“离堆”代“都江堰”，足见该词的历史底蕴与象征意义。随着公园的建成，其地作为灌县的一处名胜，吸引众多名士到此游览。如1933年，黄宾虹游览都江堰，并于离堆处写生作画。^②1940年，朱偰在游览灌县离堆后发出感叹：“再观离堆形胜，觉所谓象鼻岩者（引者按，象鼻岩为灌县离堆的俗称），屹立水中，其形弥肖。”^③至于今日，灌县离堆仍作为古代水利设施代表，以及旅游胜地的形象而被大众所知晓。

灌县离堆之说产生的直接原因，盖因唐代以后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文献内容的误读，同时，伴随着前人不断地强化论证，以及对其文化赋值，灌县离堆与李冰治水之事迹绑定愈加牢固，该说亦得以稳固至今。与之相对，乌尤离堆为治水离堆之说，在唐世以后或隐而不显，或显而不彰^④，但其仍潜隐于地方叙事中，关于李冰治水的历史记忆在特定情境下被唤醒。^⑤

三 雅州治水离堆的生成与变迁

唐代以后，除灌县离堆之说兴起外，也产生了雅州治水离堆之说。相较灌县离堆，雅州离堆的产生，更多是因文献的错讹与误读，此也导致其名实变迁更为复杂，前人对其的诠释也显得尤为混乱。

宋代关于雅州离堆的记载，大多引自唐代某《郡国志》，其原本内容业已失传，后之转引内容差异较大，对雅州离堆的诠释也分歧颇多。中华书局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影印宋刻本《太平御览》相关记载为：

《郡国志》曰：“汉源县有离崖，即蜀守李冰所凿。离堆，即古雅也。”^⑥

然而，明万历元年（1573）刻本、张海鹏从善堂清嘉庆年间刻本、喜多邨氏学训堂日本安政二年（1855）刻本，此句均载为：

《郡国志》曰：“汉源县有离崖，即蜀守李冰所凿。按离，即古雅也。”^⑦

按，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《太平御览》，主体为日本藏南宋蜀刻本《太平御览》，又配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及喜多邨活字本加以补充，应最符合宋本之面貌，故以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为准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中也有相关记载，今点校本载为：

①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：《成都市志·园林志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92页。

② 参见王中秀编著：《黄宾虹年谱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300页。

③ 朱偰：《漂泊西南天地间》，正中书局，1948年，第42页。

④ 如《大明一统志》、嘉靖《四川总志》、万历《四川总志》、康熙《四川总志》均不载乌尤离堆。《蜀中广记》与雍正《四川通志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》虽有乌尤离堆的记载，然并不将其与李冰治水相联系。

⑤ 如宋人张方于乐山开凿新渠，疏浚水道，作《夷佛滩记》一文以纪功时，论李冰凿乌尤离堆之事，再如周洪谟《魏公堤记》一文，亦先叙李冰之功。参见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：《乐山历代文集》，内部资料，1990年，第31、57页。

⑥ 《太平御览》卷166《州郡部一二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影印本，第1册，第809页。

⑦ 《太平御览》卷166《州郡部一二》，倪炳明万历元年刻本，第7页；《太平御览》卷166《州郡部一二》，张海鹏从善堂清嘉庆九十四年（1804—1809）刻本，第7页；《太平御览》卷166《州郡部一二》，喜多邨氏学训堂日本安政二年活字本，第6页。

按《郡国志》云：“汉源县有离崖，即蜀守李冰所凿离堆，‘崖’，即古为‘雅’字也。”州以此为名。^①

然红杏山房本则作：

按《郡国志》云：“汉源县有黎崖，即蜀守李冰所凿，离即古为雅字也。”州以此为名。^②

点校本改动过大，红杏山房本基本与《太平御览》记载相同，应以此为准。同时，《太平寰宇记》中亦载有：“离崖，秦蜀守李冰所凿，以导江，是此崖。音雅。”^③

由此，可以确认唐代即已出现汉源县李冰凿离堆之说，其被称为“离崖”或“黎崖”，并认为雅州因之而得名。然而，相关记载也显现出两点矛盾：其一，宋人认为雅州因“离崖”“黎崖”而得名，然存在“离即古为雅字也”与“崖音雅”两种不同的解释。其二，这也关涉“离崖”与“黎崖”以何为准，若以“离崖”为是，则尚可解释“离古为雅字”；若以“黎崖”为是，则前说不可成立。

南宋《舆地纪胜》对雅州离堆的记载，以上矛盾并未被消解。赵一生点校本对雅州离堆的记载为：

离堆，《郡国志》：汉〔源〕县有离（堆）〔崖〕，蜀守李冰所凿离（堆）〔崖〕，即古〔雅〕字，故州以雅为名。《寰宇记》曰：离崖，（离）〔崖〕音雅。^④

此是据惧盈斋清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所刻宋抄本《舆地纪胜》，增补文字更变句读所成。其原文为：

离堆，《郡国志》：汉县有离堆，蜀守李冰所凿，离即古雅字，故州以雅为名。《寰宇记》曰：离崖，离音雅。^⑤

除“汉县”应作“汉源县”外，该段记载惧盈斋本与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相关内容差异更小，故应以此为准。

《舆地纪胜》雅州卷中，除载“离堆”条目外，亦载有“黎崖、黎堆”条目：“黎崖、黎堆，自是两处，一在永康，一在沈黎。故在沈黎者为离崖，故史称避沫水之害是也，在永康者为离堆，今在永康皂江之侧是也。”^⑥此外，其在雅州沿革中，对雅州得名解释却又为：“《寰宇记》云：名山有离崖，崖音雅，州以此名。”^⑦由此，王象之采取的态度是因袭旧说，亦将文字

① 乐史撰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7《雅州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550页。

② 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7《雅州》，金溪赵承恩红杏山房清末刻本，第2页。

③ 乐史撰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7《雅州》，第1553页。

④ 王象之编著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47《雅州》，第3131页。

⑤ 王象之编著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47《雅州》，惧盈斋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，第5页。

⑥ 王象之编著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47《雅州》，第3131页。

⑦ 王象之编著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47《雅州》，第3126页。

的矛盾继承，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，此一离堆是在汉源县还是在名山县？

《方輿胜览》中则仅取“崖音雅”之说：“离崖山，秦蜀守李冰所凿，以导江。崖音雅。”^①明人杨慎作《离堆》一文，认为李冰所凿之离堆在雅州，灌县离堆之兴起是因“盖李冰穿三江于灌口庙食于此，后人遂以离堆之名移之灌县耳”^②。又作《离崖离堆辩》一文，指出“崖”与“𡵓”形近而互讹，“离”与“黎”音同而互书。^③上述均为睿见，然其仍将落脚点置于“离古为雅字”，并未有太强的说服力。

笔者认为，雅州离堆在生成之初，本就作“离堆（𡵓）”，后因“离堆（𡵓）”与“离（黎）崖”的形近、音近导致互讹，从而形成相互之间的纠葛交杂，也导致以“离（黎）崖”释雅州得名的混乱。首先，“𡵓”“崖”两字形近，故“离𡵓”被讹为“离崖”；其次，“离”“黎”两字音近，又被讹为“黎崖”；其三，“离（繁体離）”“雅”两字形近，故对雅州得名由来的诠释，出现“离即古为雅字也”的说法；最后，“崖”“雅”两字音近，故对雅州的释名，又出现“崖音雅”之说。

以上四处互讹或在唐代便已产生，方可解释宋人对雅州离堆诠释的混杂情况，同时也可说明离堆（崖）为何从汉源县被移至名山县。有宋一代，汉源县始终隶属黎州，而不隶雅州，宋人不至于用黎州之离堆（崖）解释雅州之得名。隋唐时期，汉源县则有相当一段时间归属雅州（临邛郡）管辖，直至唐开元四年（716），汉源不再隶雅州。^④故，以汉源离堆（崖）解释雅州得名，必定是产生自唐开元四年以前。后因汉源县不再隶属雅州，故《輿地纪胜》中将汉源离堆移置为名山离堆。

宋人对雅州离堆的叙述偏重于释字，对雅州离堆的具体位置与地势景观则着墨不多。明清时人实际上对雅州离堆所在何处已不甚明晰，更是对雅州离堆进行了多处重构。《大明一统志》、嘉靖《四川总志》、万历《四川总志》、康熙《四川总志》中均无雅州离堆的记载，《蜀中广记》虽载有“洪雅县界有洪雅川，源出离堆，离即雅也”^⑤，并称洪雅川为“离堆川”^⑥，但并未说明该离堆的具体位置。

直至清中后期，被重构为雅州离堆之地有三处。其一，为雅安山（月心山），乾隆《雅州府志》载：“雅安山……一名月心山。按《坤元录》《郡图志》云李冰所凿离堆在其地，此因雅州亦有沫水而传讹耳，考离堆山在灌县治西，沫水在灌县西南为岷江之源，未可以此混彼。”^⑦此说被县志否定后并无太大影响。其二，为多功峡，明人甘来学有诗《飞仙关》：“谁辨离堆不雅州，多功峡内看山头。禹王治水真神力，劈破千层伏地流。”^⑧可见明代多功峡离堆说便已产生。其三，为雅嘉界上之龟都峡，清人陈一津有诗《舟行龟都峡》，其诗云：“当年秦太守，曾此凿离堆。”^⑨后两说之影响较大，《吾鼎斋日记》中称蜀有七处离堆，其中列有多功峡与龟都峡两

① 祝穆撰，祝洙增订，施和金点校：《方輿胜览》卷55《雅州》，第978页。

② 杨慎：《升庵集》卷78，“四库明人文集丛刊”，第1270册，第779页。

③ 参见杨慎：《离崖离堆辩》，杜应芳、胡承诏辑：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卷33，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刻本，第31—32页。

④ 参见郭声波：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（下）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972页。

⑤ 曹学佺撰，杨世文点校：《蜀中广记》卷52《蜀郡县古今通释第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566页。

⑥ 曹学佺撰，杨世文点校：《蜀中广记》卷11《蜀中名胜记第十一》，第130页。

⑦ 乾隆《雅州府志》卷2《山川》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刻本，第21页。

⑧ 乾隆《雅州府志》卷16《艺文下·七言绝》，第65页。

⑨ 同治《嘉定府志》卷42《艺文志·诗三》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刻本，第50页。

处：“其一在雅州，《雅州志》多功峡，大禹治水用功独多者是也；其一在雅州、嘉定界上，曰龟都。”^①

纵览雅州离堆的生成、变迁，唐代汉源离堆之说产生，宋代其被移置于名山县，明清以降又产生雅安山、多功峡、龟都峡三说，名实变迁相当频繁。笔者认为，雅州离堆之说出现的原因，主要在于文献的错讹与后人的误读。影响最著者为《水经注》相关记载：

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，水脉漂疾，破害舟船，历代为患。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，河神鬲怒，冰乃操刀入水与神斗，遂平溷崖。通正水路，开处，即冰所穿也。^②

此段文字显是继承《华阳国志》的相关记载，然将“会江南安，触山胁溷崖”误作“南安西溷崖”。唐人或凭此为据，将离堆置于汉源，以合南安县西与沫水上的方位。宋代因汉源县不隶雅州，以离（黎）堆（崖）释雅州得名不妥，故将离堆置于名山县，然亦并不违背“南安西”的方位。

明清时人已不识前人所谓雅州离堆的具体位置，只得依托离堆在“南安西”的记载，结合雅州境内符合“水脉漂疾”而被“通正水道”之处，重构出多功峡与龟都峡二离堆。此两处离堆均在青衣江上，与《水经注》所谓“南安西”的方位贴合，《吾鼎斋日记》对龟都峡离堆的论证便以此为凭：“《史记·河渠志》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，所谓离堆亦指嘉雅界上者言之，《水经注》称溷岩在南安西是也。”^③

在水道实况上，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对多功峡的描述为：“崖如刀截，壁立千仞，中通一线，相传禹治水于此，用功为多，故名。”^④水势险要加之大禹治水的传说，使得李冰治水离堆也被附会于此。对于龟都峡，嘉庆《洪雅县志》则载：“龟都大石当中流若巖巖然，长几一里，上有庙祀李冰。青衣江自雅州来，出其西……怒涛惊湍，声震若雷，常为舟船害，谓之曰雷垣无疑。”^⑤可见，青衣江在多功峡与龟都峡，均是河道狭窄、水流迅疾、险滩众多，符合“水脉漂疾”的特征。这种地理形势，也是前人将离堆重构于此的重要原因。

总体而言，雅州离堆虽保留了通正水道的功能，但前人对其争论颇多，文本记载存在差异且自相矛盾，明清时期更是重构出三处。从侧面也反映出，前人对雅州离堆的认知并不稳固，其说亦非主流。

结 语

自唐代至今，关于李冰治水离堆的争论未曾休止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对其认知也愈发多歧、混乱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前人学者对该问题，多先入为主地认定治水离堆的意涵与功能，并择取相对片面的文献以论证，缺乏对治水离堆名实迁转与意涵变迁的整体考察，在史料文献的使用上，也

① 嘉庆《嘉定府志》卷48《艺文志·杂著》，嘉庆八年（1803）刻本，第37页。“蜀称离堆有七”之说出自清人李璋煜《吾鼎斋日记》，分别位于：夔州、苍溪、南部、乐山、灌县、雅州多功峡、嘉雅界上龟都峡，其中李氏认为灌县、多功峡、龟都峡三处为李冰所凿，其余为天造地设之离堆。李璋煜其人大约于嘉庆年间任四川司郎中，《吾鼎斋日记》今似已失传，然嘉庆《嘉定府志》最早引有其书的内容，故该说应亦出自清嘉庆年间。

②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36《沫水》，第828页。

③ 嘉庆《嘉定府志》卷48《艺文志·杂著》，第37页。

④ 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24《山川中》，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抄本，第71页。

⑤ 嘉庆《洪雅县志》卷2《方輿志·山川》，嘉庆十八年刻本，第13页。

缺乏相应的批判性态度。

通过上文的考证梳理,唐代以前文献记载的治水离堆,应为今乐山乌尤山,古蜀人因对青衣神的信仰,以神名山,以“嫫祖”“雷砥”之音称乌尤山。离堆一词,实则是司马迁结合中原知识体系,对古蜀读音的汉语翻译。唐代以后,由于离堆原初意涵已不被知悉,加之文献本身的讹讹与前人的误读,出现了灌县离堆与雅州离堆两说。灌县离堆之说在后世成为主流,使得治水离堆作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分水设施的意涵,稳固存续于前人的认知中;雅州离堆之说的名实变迁颇为复杂,其因形近、音近而讹变出“黎崖”“离崖”等词与雅州得名纠缠不清,也被区位重构至不同地方。治水离堆作为一个多元面相的文化符号,在不同的语境下,被不同群体所认知、利用,展现出多维度、多层次的特征。

清人胡渭在论及离堆时有言:“大抵岷山左右,其地名多古今舛戾……谈禹贡者,终当以古为是,灌县之离堆亦此类也。”^①意在提示对巴蜀史地的考证,不可忽略历史变迁所造成的名实错乱。除治水离堆外,巴蜀地区与之相类的具体实例仍有许多。^②历史上,巴蜀地区的发展经历过数次高峰与低谷,随着主体人群的更易,文化亦有明显的断层,从文化实体层面看,或并无延续路径清晰、一以贯之的巴蜀文化。后世人群对巴蜀历史遗迹与历史记忆的大量重构与重塑,虽与历史实况不相符,但也可视为在地域认同的基础上,对地方历史的重新找寻与意义赋予,换言之,其秉持着巴蜀史为整体的理念,在断裂中寻求延续。在不断形塑着巴蜀历史文化的同时,该过程本身也成为今人可探讨的重要内容。同时,离堆这一个案也反映出传统时代地理认知“重名轻地”的取向以及空间认知的虚拟性。^③文本记载的模糊性与流传过程中的讹变,造成后人认知的信度不可过高估量。以批判性的思维看待史料,以求证古史、古地,采取顺时而观的视角,考证生成、流变与相关的历史语境,亦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路径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)

本文责编:周全 宿万涛

① 胡渭著,邹逸麟整理:《禹贡锥指》,第275页。

② 参见蓝勇、陈俊梁:《古代巴蜀界山:青石山、龙多山异同考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19年第6期;聂炜鑫:《表象与本相:“铜梁”的山岳名实演变与县名建构》,《地方文化研究》2023年第4期。

③ 关于古代中国空间认知的虚拟性,可参见蓝勇:《中国古代空间认知虚拟性与区位重构——以金牛道川陕交界段路线体系变迁为中心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21年第4期。